

中國教育史要略

第一章

導 論



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，但也由於「一部二十五史不知從何說起」，因此欲憑一個人的力量，撰寫一部包羅萬象、巨細靡遺的中國通史，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。同樣的理由，要以一己之力撰成一部翔實而精審的中國教育史，亦非易事。海峽對岸，近年來流行以集體的力量，組成研究小組，究成了幾部中國教育全史與中國教育思想史的大部頭著作。此一方式瑕瑜互見，優劣相參；優點是群策群力，衆擎易舉，能在短期內達成任務，缺點是觀點不一，體例參差，更令人詬病的是，在組織領導下，難以跳脫教條的框架。相較於此間，單打獨鬥的模式仍盛於集體創作，其得失亦與彼岸互異；筆者數十年來從事中國教育史的教學與研究，便是在此矛盾與困境下進行。

談到有關個人從事中國教育史的研究歷程與實際經驗，可溯源於在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撰寫碩士論文；當年師大教研所初設，筆路藍縷，規模未具，一切均因陋就簡。以師資與課程而論，是有什麼師資就開什麼課，而不是先訂課程，然後按課程的需要去聘請師資。由於當年的教授陣容，自主任田培林、專任教授黃建中、兼任教授陳康、吳康、王文俊、以及稍後的趙雅博與李貴良諸先生，都具有專精中西哲學的背景，以此所開的課程，多偏於中西哲學史與歷代哲學家的教育思想；至今該所仍有重視哲學史的傳統，並為其特色之一。早期研究生的論文題目，亦多偏於中西教育家的思想方面的研究，而以中國教育思想研究的題目為最多。這是因為專任教授黃建中所開的課最多，所指導的論文也最多。黃教授當年所開的課程，除中國哲學史外，先秦諸子與宋明理學各家各派的教育思想，大部分都開過，故而前幾期研究生的論文題目，遂偏向於中國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，筆者的碩士論文〈伊川教育思想之研究〉，便是在黃教授的指導下完成的。這是我初次踏入學術研究的領域。黃教授學植深厚，循循善誘，一年的論文撰寫期間，在其盡心的指導下，不但使我在研究方法與研究規範方面獲益良多，更重要的是，啓導了我其後研究中國教育史的

志趣。繼此之後數十年，以學以教，鑽研的重點始終以中國教育史為主軸；偶有旁鶩，亦迅即迷途知返。數十年之間，先後完成專著約二十餘種，論文逾百篇，其中泰半為中國教育史之論著，而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又各約占百分之五十。嗣先後匯整為《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》（民國七十一年、台北、三民）與《中國教育思想史大綱》（民國九十五年、台北、五南）付梓問世；雖云敝帚自珍，然前者曾獲教育部民國七十二年教育學術獎，後者甫問世即為大學教育系所採用為教材，因而增強了我撰寫一部簡要而不落窠臼的中國教育史的意念。雖然有上述兩書為基礎，但重新構思、擬定綱要、安排章節、考訂資料、以至屬筆為文，仍然大費周章，艱難不亞於另起爐灶。此其原因甚多，主要係基於下述的考慮：首先、不作資料的堆砌，因此必須刪繁就簡，取捨之間，斟酌為難；其次、凡過去資料引用有思慮不周，觀念詮釋有欠妥貼，以及行文語義含混之處，都必須一一重加考慮並予以修正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，要能凸顯中國教育不同階段發展的特色，言簡意賅，俾可加深印象，利於記憶。基於最後一項考慮，因將中國教育史的發展分為八個階段：上古官學時期、先秦私學時期、兩漢太學時期（秦代附）、魏晉異化時期（南北朝附）、隋唐科舉時期、宋明書院時期、清代變革時期、與民國西化時期，並以之標示章節，簡要予以論述。歷時兩年有餘，終於完成初稿。

在數十年學習、研究中國教育史的歷程中，遭遇到的問題或困擾頗為不貲；擇要而言：第一、體裁問題：中國人素有重視教育的傳統，但在近代以前，中國從未以教育為一門獨立的學問，作為研究的對象，分門別類的教育著作亦未在中國出現。就中國教育史而言，近代因變法維新而興辦學校，各級各類學校的課程，特別是大學的課程，幾乎全部自西方移植，教師亦多由西方人士擔任。最初大學教育系的課程中，有教育史一科，但講授的內容只有西洋教育史而無中國教育史；後來在西洋教育史之末附加中國教育史的章節，最後中

國教育史才獨立開課，而且第一部中國教育史的著作還是日本人寫的。影響所及，大學教育系的課程，中國教育史一直排在西洋教育史之後，研究及編寫中國教育史亦多沿用西洋教育史的架構與體裁，比照西洋教育史的發展，將中國教育史的演進分為上古、中古、近代與現代等階段，作通史式的敘述。然而，中西歷史的長短不同，發展的過程亦有遲速的差異，勉強襲用西方教育史的分期，難免有削足適履、甚或扞格不入的情況。近年來專題式的體裁日漸流行，如以中國的科舉制度、婦女教育等為題，進行專題式的研究，雖可跳脫通史體裁的窠臼，但歷史的發展如無時間的要素以為貫串，則易與時代精神脫節，難以掌握歷史過程中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，更不能了然彼此之間的交互影響與因果關係。以此，本書遂將中國教育的演進，分成八個不同的階段，並以不同階段教育設施的重點標示其特色（見前），雖不敢自詡別出心裁，但交待清楚，使人讀之一目瞭然。

第二、資料問題：研究中國教育史的重點，主要在於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兩方面，故本書關於研究資料問題的處理，亦以這兩方面為主。由於傳統中國教育不是一門獨立的學問，故而記載教育設施（概括為教育制度）與討論教育問題（概括為教育思想）的資料，均散見於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中；篇帙浩繁，搜尋教育資料，幾如大海撈針、也可說是俯拾即是。大體來說，蒐集研究教育制的資料較教育思想為易，因為歷朝歷代的具體教育設施，包括學校規制、教育內容、教育方法、以及學生管理等，正史中均有頗為詳盡的記載，稍事蒐集並整理，便可獲得有系統的資料；尤以後世有各種類書（如三通等）的佐助，搜尋更為便捷。如今又有電腦的線上（on line）服務，資料的蒐集已不是問題，反而資料的篩選要大傷腦筋。至於研究教育思想，由於研究的對象是個別教育家的主張與見解，故而整理出一個頭緒並建構成系統的學說，顯然難度較高，而非易事。首先、是資料的來源，除四部外，傳紀、年譜、語錄、劄記、家書、日記、函件與佚

聞，以及後人發現或出土的文獻，如敦煌抄本與漢簡等，無一不是可能的來源。其次、是資料取得後，除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等方面的問題，可以存而不論外，有關資料的整理、鑑別、考訂、詮釋與論斷等諸多問題，要能妥善處理，無不需經反覆推敲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，乃是如何運用、組織所獲得的資料，建構一位教育家的思想體系；而此又涉及時代背景、思想淵源、中心概念、學說要點及創見，要能客觀、正確、精要地介紹一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，更是考慮再三始敢定論。

研究中國教育史，資料而外，方法也是一個不可輕忽的問題。由於教育是一門多科整合（multi-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）的學問，鄰近的學門極多，諸如：哲學、倫理學、社會學、心理學、生理學、人類學、史學、以及政治學、經濟學、甚至各種自然科學，都或多或少與教育有程度不同的關係；以致教育在內容與方法等方面，均受到上述諸學門的影響，而不能成為一門完全獨立的學科。就研究方法而言，早期研究教育的方法，多係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，而以偏於哲學的方法為多，故傳統的教育學可以稱為哲學的教育學。近代自然科學突飛猛進，研究教育又兼採科學的方法，期使教育科學化，成為科學的教育學。有很長一段時間，研究教育的方法，大致不外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兩大類；量化研究是要以客觀的數量來解釋複雜的教育現象，並建立律則性的知識，而質性研究則主張教育是一種精神科學，強調價值與事實、對象與方法不可分，並且否定方法的普遍性，教育的研究不是建立律則性的知識，而是要詮釋現象背後的意義。這兩類研究方法，各有適用的範圍與限制，須視研究的對象與問題的性質而決定採用何種方法，不可一概而論。

晚近教育研究的發展，綜括起來，呈現三種取向並立的趨勢：(一)「經驗—分析」的研究取向，(二)「詮釋—理解」的研究取向，(三)「社會批判」的研究取向。究之其實，三種取向的前二取向，乃是量

化研究與質性研究的延續，僅第三種「社會批判」的研究取向，試圖從教育與社會的關係中，了解教育活動背後的可能存在的社會意識型態、宰制的關係，然後透過教學的活動，來啟發教育者與學習者的批判意識，進而促發教育實踐來改造社會及提升自我，可說是另闢蹊徑，最為適合教育史、特別是中國教育史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。原因在於：一方面是因為教育為一門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學問，理論如不能應用於實際，則不能印證其正確性與顯示其價值性；另一方面乃由於中國人做學問，傳統都重視實踐，主張行重於知，認為「吾欲徒托空言，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」，故歷代教育家的思想與學說莫不強調力行與踐履（參見以下各章「教育思想」）。基於此種認識與體驗，以此在拙著《中國教育思想史大綱》（民國九十五年、台北、五南）中，遂以「中國教育思想與人類前途」為結論；文中除批判西方「主導現代世界的三大思潮」外，並針對此三大主流思想，「征服自然」、「生存競爭」、及「資本主義」，對於世界及人類生存的危害與威脅，提出「中國教育思想如何偏救蔽」的主張與見解，認為文化中關於「人在宇宙的定位」、「人與群體的關係」、與「人對自我的要求」三方所建立的宇宙觀、世界觀及人生觀，正可補救並矯正西方文明的偏頗與缺失，以期能維護「人類的永續生存」。至於如何坐言起行、劍及履及，將認知與行動結合，在行為上實踐所求得的知識，爰不揣剪陋，提出四項可為踐履的準則：長存敬畏感恩之心；永懷仁民愛物之情；多盡生態環保之力；泯除爭強好勝之念。拙見以為上述四項準則，如能身體力行、加以實踐，並以教育工作者的身分，「以先知覺後知，以先覺覺後覺」，喚醒地球村的全體居民，群策群力，朝著共同的理想與方向前進，則中國先哲所嚮往的「大同世界」終必將到來，而人類的永續生存與發展亦必可預期。這可說是中國的教育工作者，對於世界與人類能盡也是應盡的責任。但不幸的是，中國近代以降的一切教育設施與興革，僅徒事抄襲與模仿，喪失自我的

主體性，不知取長補短，反而取短棄長，以致迄今不但學術不能獨立，甚至科學亦未在國內生根。值得反省與檢討，並引以為鑑戒。

最後，尚須補充說明的是，本書之所以定名為《中國教育史要略》而不逕名為《中國教育史》，乃是因為本書力求精簡，不願作材料的堆砌，僅擇其要而略言之，以免重禍梨棗，故凡無可靠資料的證實，皆略而不論，如史前時期各種神話，傳聞異詞，難以確認，故不予列論。又如論各家各派的教育思想，除主要代表人物外，其餘再傳、別傳以及相關流派，亦為節省篇幅而不多加衍述。又教育是一門理論與實際並重的學問，故本書於敘述史實之外，兼及於評論得失暨如何踐履之道，或不盡符合純史學的體裁，不得已出之以要略之名，靦顏自見，期與共學之士討論，並就教於大雅方聞。

中國教育史要略

第二章

上古官學時期



我國歷史悠久，文化發達甚早：遠古的傳說雖未可盡信，然據近代地下發現史料的考證，夏商兩代之事固極可信，就是唐虞的存在，亦有高度的可能性。至於我國上古時期的教育，據各種典籍的記載，正式教育係萌芽於虞夏，而學校制度則建立於殷周。探究我國上古時期教育設施的資料，就起源與宗旨而言，莫古於《尚書》；就學制與教科而論，莫詳於周禮王制及文王世子；就原理與教法來看，莫過於《學記》；就校規與學則來說，莫備於弟子職；另論學前教育（蒙養）與女子教育，尚有內則等。其餘先秦諸子之書，特別是儒家的著作，其中亦間有可採的資料。唯在此宜加以說明的，凡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所興辦的學校，均係官立，這是由於我國上古「官師合一，政教不分」的傳統所造成。以此，本文關於我國此一時期教育設施的論述，特為標出「官學」字樣，即在顯示其時代的特色。

第一節

時代背景

《論語》中有一段記載孔子的話說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，可知也。」這是說明社會文化的發展，是由逐漸累積與演進而來。中國上古時期教育的發展、亦是如此；由虞、夏、商逐步演進，至西周而集其大成。西周之制固承襲於殷商，實亦損益虞、夏、商三代之制而形成。至於影響此一時期教育的發展與變遷的，則更有此一千餘年間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與文化的各種背景。

在政治上，此一時期中國逐漸由部落形成國家，最後並建立封建的制度。封建制度雖極盛於周，但並不始於周。在周以前，唐虞兩代大概還在部落時期，所謂的堯舜「禮讓」，實係部落酋長推選「共主」的制度，與滿清未入關前推選八旗共主類似。至夏代則已